

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文化翻译的影响

陈 琪

(四川理工学院 外语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人类的个体行为必然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具有他人导向性的明显特征,这一特征必然对译者个体的文化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译者的翻译思想和行为。从关注他人、“大我优先”和关系中心三个方面探讨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文化翻译的影响,能够深化对译者在文化翻译活动中心理特征的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的他人导向性特征,让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尤其关注他人、关注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但是,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影响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

关键词: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译者;文化翻译;心理特征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2)03-0065-04

对于人类行为的探索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而人类行为研究本身是具有多个维度的,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本文主要关注人类的社会行为。社会学家韦伯认为,“社会行为是行动者按照其主观意义把他人将怎样行动的目的纳入自己的行为,并使自己适合他人的行动方针”^[1]。社会的正常运转是由众多的个人和社会行为构成的,而社会行为取向会对特定社会的运转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也对了解该社会中具体活动有指导性意义。本文试图分析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对中国译者的文化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翻译活动中的译者因素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一、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

社会行为取向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趋势,因此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研究发现,制约社会行为的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后者是决定性因素^{[1]205-216}。对特定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行为取向,本土研究者与国外研究者各具优势,他们的研

究都有重要价值。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全德斯等人使用的二元范式,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是集体主义^[2]。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沈毅将这些本土研究归结为三种研究范式,即“自我主义”、“大我优先”和“关系取向”^[3]。比如,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是“自我主义”^[4];杨中芳构建了“大我优先”,认为中国人更倾向于以牺牲小我的方式成就大我^[5];许烺光提出了“情境中心”,认为中国人重视彼此依赖的以情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人们委曲圆滑以赢得他人的嘉许^[6];何友晖等人则认为,中国人的生存论是以关系为中心,因此提出了“关系取向”^{[1]228}。但是,不管提出的具体理论模式如何,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在进行自己的社会行为时,他人导向性的特点比较突出。

美国学者理斯曼研究美国民族性格时,将民族性格划分为:传统导向型、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他认为,“他人导向性格的人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导向的不同而改变,只有追求过程本身和密切关注他人举止的过程终其一生不变。这种与他人保持联络的方式易促

收稿日期:2012-04-05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联资助项目(SC11B019);四川省省教厅资助项目(P09253)

作者简介:陈 琪(1980-),女,四川渠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西文化对比。

网络出版时间:2012-4-18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20418.2342.007.html>

成其行为的顺承性,此种顺承不像传统导向那样通过行为本身的训练进行,而是通过对他人的行动和愿望保持某种特殊的敏感性来进行。”^[6]他人导向性格的人,非常关注他人,容易受到他人观点、行为的影响,其自身的行为选择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博得他人和社会的褒扬。中国人比较明显的他人导向性取向,对中国译者进行翻译活动会起到何种影响呢?

二、译者的翻译活动

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解和交流困难,是翻译出现并逐步发展的原动力。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必然,是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球美的艺术^[7]。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语言自身的有限性,必然存在模糊语言^[8]。这就为翻译的创造性预留了空间,但由于此种创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创造”,故长期以来都不被视为创造性的活动。原作被译成他国文字后如果获得成功,那是原作者的成功;而一旦遭遇失败,则是译者及其译文的失败。但是,这种失败时才凸现出的“译者主体性”怪象,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兴起,有了很大改变。翻译属于“权利话语”成了后现代批评家们的新见解^[9]。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译者的文化身份、译者的操纵性等问题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内容,译者在翻译活动全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越发凸显。译者不仅仅是僵化表现出原文,而在翻译活动的始终都在创造性地工作。彼得·纽马克认为,翻译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基本程序^[10]。译者要做好翻译过程中“理解”阶段的工作,至少要通晓两种不同的语言,并对语言所代表的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只有了解原文的创作意境和原文涉及的文化意象,才能做到译文忠实于原文”^[11]。在后一个“表达”阶段中,译者仍然需要尽可能深入理解文化间的异同,才能针对文化特点,选择恰当的翻译方式,最终完成翻译活动。赫曼斯就指出,“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所译作品的情况”^[12]。姑且不论此话是否太过绝对,但译者的重要性在这句话中表露无遗。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因此厘清其中译者的行为特征就是十分有意义的了。

必须指出的是,译者生活的环境不是“真空”地带,译者首先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的,他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生活的社会和社会所凝练出的文化,离不开他生存活动范围中的相关人员。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也不是超然的、绝对中立的,他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身上沉淀下来的文化心理印记留在译文之中。如前文所述,行为有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之分,而译者的个体行为是与他生活的社会中人群的社会行

为取向密切相关的。译者的个体行为必然受到整个社会行为取向的影响,尤其是在以他人导向性为特征的社会行为取向。因为终其一生关注过程与他人举止,关注他人和群体对自身行为的评价,个体行为的选择和行动受群体社会行为取向的影响更大,社会行为取向与个体行为的密切度也就相应更高。在中国这个以他人导向性为显著特征的社会群体中,人们普遍的行为取向必定会对中国译者的个体翻译活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对中国译者进行文化翻译的影响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

三、他导性取向对译者文化翻译的影响

(一)关注他人与权威

社会心理学者认为中国人他人导向性社会取向特征比较明显,这种他导性的关键因素就是持久地关注“他人”的想法、意见、精神、观点等。对他人反映的关注是具有他导性性格特征的社会人所固有的理念和行为,只是其中“他人”的指向性是不明确的。这种指向的不明确性,让社会中的不同人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人导向性的社会取向,让人自觉或不自觉持久地关注他人,以他人的喜好为出发点,看重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及行为举止的适当性,让人愿意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规范在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去挑战现实,挑战群体意识。这种中国人的他人导向性社会取向,让中国的译者同样具有了以上的一些心理特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随时关注他人对自己所进行的翻译活动的看法和评价,关注自身翻译行为的适当性;而他人对自己翻译活动的认同与翻译中文化问题的成功解决与否紧密相连。权威作为一个群体中的特殊成员,对他导性社会取向的人群尤其会产生特别的影响。“权威”二字在《现代汉语词典》(1994年版)中被解释为“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或者是“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可见,在一个群体中,权威是让人信服的、最有地位的。相应地,权威也会为努力维系这个群体,保持群体文化而付出更多的努力。在关注、着重他人的心理状态下,中国的译者对权威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更高,希望得到权威肯定,至少是不反对的、渴望也更迫切,针对权威的反抗精神较之西方人会更弱一些。文化差异是翻译出现并进行的根本动力,不同文化之中都有代表文化特征的权威,或者说权威对本土文化的维护力更大。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译文与原作出现了文化方面的冲突,考虑权威地位与影响的时候就会更多,通过改变自己的翻译方式、翻译策略、翻译审美

价值等方面让译文适应权威,或者至少是不主动挑战权威的情况也会更多。而译者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尽量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在现实的基础上,能够得到权威的认可,进而得到群体的认同,实现他导性社会行为取向心理下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二)“大我优先”与从众

“大我优先”是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者提出的概念,其实质是在中国文化宣扬家国一体之下,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与中国人的他人导向性社会行为取向是分不开的,突出了中国人思想中“和为贵”和“公为先”的行为特征。同时,这种心理,也让个体在小我与大我发生冲突时,更不愿意成为“越轨者”,更愿意自动转变态度,让小我来适应大我。而“从众性”是集体主义观念较强的人群中容易出现的一种倾向。社会心理学认为,“从众是指个人在社会群体压力下,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与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是外部社会对人的一种心理影响与行为影响。”^[13]从众性不仅有思想方面的,也有行为上的。个体从众多是为了确保做法的正确性和群体成员的认可度。究其根本,总是外部社会通过隐性或显性的社会压力,来迫使个体以让步方式,令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符合群体的、社会的标准和规范,而个体也在这一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得到了在群体中的安全感和平衡感。中国译者他人导向性社会行为取向下的“大我优先”理念,使得他们更愿意牺牲自我的利益来实现群体利益,其翻译方面的从众性表现得比西方译者更为突出一些。这种“从众性”在译者身上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翻译活动没有进行之前,外部社会的文化发展和文化需求就不断给译者以显性或隐性的压力,让译者自觉修正自己在翻译观点、翻译审美倾向、翻译策略等方面与群体的差距,以使自己的翻译工作适应外部社会文化的发展要求,确保进行翻译前所形成的翻译目的和选择进行翻译的材料符合群体的标准和规范;另一方面,当译者在翻译活动进行过程中遭遇到自身期望和群体期望不一致的文化差异时,更倾向于通过转变自己的翻译态度等来让自己的译文适应当时外部社会对翻译中文化因素处理的要求,适应特定群体对译文的期望,而不是坚持自己原有的翻译理念和观点,除非译者在翻译之初就抱定做一个文化“叛逆者”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方面,译者让自己的翻译行为更好地适应和符合群体的要求,缓解了冲突,以获取在群体中的安全感和心理上的平衡。

(三)关系中心与中庸

在中国这个他导性取向明显的社会中,关系是个

体生存的核心问题,对社会行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并非个体本身,而是个体附着其上的关系背景。个体在现有社会秩序中能够安身立命的需要高于表现自我个性的需要,社会规范性的互动模式是要维持和睦与和谐,避免出现公开的冲突。受这种心理趋向支配,“中庸之道”在中国会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个体思想和行为准则的“中庸之道”或多或少会在译者个体的翻译活动中发挥影响。此种心理特征下,与西方译者相比,中国译者在涉及到体现社会特点的相关文化的翻译上,尽量避免矛盾的愿望就更为迫切。这要求译者至少要尽力避免与原作者、原作、目标读者、译作、自我和己方要求之间的矛盾。原作者是原作的构思者与撰写人,原作能够体现原作者的思想、意识、精神和理念。但原作自诞生起,又是独立存在的,具有原作者不能完全支配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在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原作的理解和认识本身就会出现不同。译者对原作要进行解读,对原作者同样要进行解读。解读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原作所体现的文化与译者期望不吻合的地方,此时有他人导向性社会行为取向,以关系作为人生存与立足中心的译者会自动弥合差距,找到一条双方都能得到适当体现的中间翻译道路。对于目标读者而言,在阅读译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这种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尽管它可能是模糊的。接受美学将其称之为“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主要指由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文本及文本创造的预期结构^[14]。伊塞尔认为,文学作品拥有艺术和审美两极,艺术属于作者文本,而审美属于读者^[15]。译文是供目标读者阅读并判断是否合乎文化“标准”的文本载体。为避免与目标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矛盾,译者会更倾向于在翻译之初就对此期待视野的内容作一个预判,并在翻译活动过程中,采取一系列做法(如更改翻译策略等)让译文与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相吻合,让文化沟通能够顺利进行。而就译者自身和己方要求而言,译者在弥合与原作者、原作、目标读者、译作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委曲求全地适当更改了自身和己方的部分文化要求。但是,需要说明,由于他导性社会行为取向而来的关系中心思想,让中国译者在委曲自身文化要求以适应他方的程度上,要明显高于以委曲己方文化要求来适应他方,因为己方中也有部分他方的存在。

四、结 语

他人导向性是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的明显特征,

它势必对生活于中国社会中的译者产生相当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译者的翻译思想和行为,因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在他人导向性社会行为取向下,中国译者尤其关注他人、关注关系、重视集体利益,由此而来的不愿挑战权威、从众性和中庸心理对翻译活动的开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隐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如何更好地认识译者的心理倾向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还有待今后更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 [1] 李文华.现代社会心理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 [2] 欧阳晓明.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及其结构性因素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6,(8):50.
- [3] 沈毅.人缘取向:中庸之道的人际实践——对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模式的再探讨[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5):130.
-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
- [5] 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32.
- [6] 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M].王昆,朱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
- [7] 罗益民,宋欣蓝.尽善尽美——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2):126-131.
- [8] 王艾,杜平.模糊语言现象及其交际功能[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68-70.
- [9] 方汉文.跨文化翻译中的历史阐释[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5-24.
- [10] 刘重德.西方译论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27.
- [11] 李颖.从文化影响看译者对唐诗意象的英译——以鹿德、韦利和许渊冲的译作为例[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81-84.
- [12] 赫曼斯·西奥.翻译的再现[C]//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2-13.
- [13] 肖汉仕.应用社会心理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23.
- [14] 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22.
- [15] Iser Wolfgang.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97.

责任编辑:梁雁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Social Action Orientation on a Translator's Culture Translation

CHEN Qi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A person's action must be affected by the action of a group in which the person lives. It is obvious that Chinese social action orientation belongs to the type of other-directed society, which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or's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guides the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actions to some degree.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social action orientation on a translator's culture transl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concerning over others, ego preference and connection-orientation can deepen the study about translator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s in culture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pay much special attention to others, to relationship and to collective interest because of Chinese other-directed social action orientation in their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action orientation is not absolute and inactive, but relative and changeable.

Key words: Chinese social action orientation; translator; culture translatio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